

13年,他一直坚持免费搭载路人,曾遇冷漠与误解;13年,路上的故事有温馨也有凶险,但他依然坚持一个平凡人给予社会的感动。13年后,平凡的感动中生出了更时髦的意义——低碳、节能,他也有了更大的理想……

# “顺风车王”没有终点



■本报记者 车辉

清晨6点50分,北京城正在慢慢苏醒中,居住在回龙观的王永已洗漱完毕,穿着整洁的衬衫,发动自己的奔驰座驾出门。他没有直接去自己的公司,而是在344路车站前停了下来。

与此同时,大量北京回龙观社区居民开始走上“战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加入挤车的肉搏战。战场之一就是344路车站。

一辆344路到站,马上人挤人,人挤人,只要车上有一点空间就会迅速被填满,最后一个上车的人往往是让车门关闭的弹性给塞进车的。

每次“搏斗”后,总会有人叹息着留在车外,此时王永就缓缓地开着自己的车,停在队伍长龙面前,摇开两个车窗,伸出自己的头大声喊着:“有去吗?有去吗?上车吧,我免费搭你们。”

疑惑、好奇、羞怯各种神情顿时浮现在挤车人的脸上,唯独没有信任。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甚至直往后缩。在维持秩序的车站人员的鼓励下,两个男性乘客将信将疑地上了车。

每天上班之前,王永都要这样招呼人搭自己的顺风车,整整13年,他搭载了上万名从回龙观进城上班的居民。

“比13年前好多了,那时候不仅没人上车,还会给我一句‘有病’。”王永笑称。

这13年,他换了四辆车,既有成功的满足,也有被误解的郁闷不堪,但他一直坚持了下来。“不要叫我雷锋,也别管我的奔驰车,我只有一个小心愿,让这个城市的角落都泛起平凡的感动。”

## 做好事有成就感

王永一直就是个有梦的人。从湖南邵阳来北京闯荡的时候,王永只有22岁。这个学美术的年轻人想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后来他虽然没有成为张艺谋的师弟,但却成为一名很有名气的设计师。

刚到北京,手里只有300元,即使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影响王永做好事的心情。在他看来,让别人搭顺风车是一种习惯,不是大不了的事。在农村老家,人们要出门就站在村口的公路上等搭乘过路人。上学的时候,同学们的自行车后面都载着人,如果是后面没有人的话,就说明这个人缘不好。

开始是自行车,伴随着事业的发展,王永开始打车,即使打车的时候,他也想着让别人搭个便车。有一次他去乘坐出租车去学车,外面刮着风。一个女孩在路边着急地想打车,他就让司机停下来捎带上她。一年后,这个女孩成了他的老婆。“实际上,是我搭她车,因为她去的地方比我远。”王永纠正了一下这段故事的细节。

王永下定决心开始“专业”在北京搭人上车是买车后的第一年。那天,外面下大雨,在北洼路他看到一个老太太独自在雨中踽踽,满脸都是雨水,“看到那一幕,让我立刻想起了妈妈,特别难受。”于是他专门将老太太送回了家。回到家后,儿子儿媳千恩万谢,把他奉为上宾,“那种做好事的成就感一下子油然而生,特爽快。”王永回忆。于是,从红旗、本田、奔驰到奥迪,虽然他的车越换越高级,但是给别人搭顺风车的习惯却从没改变。

## “有病,臭显摆什么!”

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长时间做好事不做坏事,王永对此话体会很深。2002年,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太难了,一腔热血老是被人误解,好事“越做越寂寞。”每次王永摇下车窗,向排队的人招呼免费搭车的时候,迎来的往往是冷漠甚至白眼。甚至有人刚等他一过去,就在后头大声说:“真有病,开个奔驰臭显摆什么?”

他曾经问一个女孩坐不坐车,结果被站在他旁边的男友误会,女孩刚要说话,男孩上来就泼了他一杯水。

开始的时候,王永很理解,认为确实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不常教育咱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但谁也架不住天天被人这么嘲讽。有一次,



被搭载的人到达目的地,和王永握手道别。本报记者 杨登峰摄

王永真急了。一家三口在雪中乘车,他过去要推他们去马甸,父亲和女儿想上车,母亲不让,说了一句:“现在什么社会,你还相信这种人。”

王永一下子急了,拉开车门对那位女士说:“您说说现在是什么社会,我自己出车出油钱送你们,我又不缺钱,你说我图什么?”后来那位女士上了车,一路上跟王永道歉,“不是大姐不信你,实在是多少年没见过这事了。”

很多时候,他不得不先跟人家说,我拉你到马甸吧,你给我10元钱,这时候很多人就会上车。“免费没人坐,收费倒都敢坐了。”

王永真的不想再干下去了,于是他给报社电台的热线打了电话,倾诉了自己的苦恼,一些媒体报道了他的烦恼,没想到,一下子他就火了。

一系列的绰号给了他——“开奔驰的雷锋”、“小人物大英雄”、“顺风车王”。每天他都乐滋滋地在网上写自己的报道,给自己鼓劲。

甚至还有回龙观的网友每天都去核实,发现王永真的是天天去344路车站免费送人,于是成为他的拥趸。如今,王永已经做得比较顺了。当他的车到了344路车站,维持秩序的协管员都知道他,直接招呼排队的

人——“马甸、双安了啊,一站!”

## “我的车就是移动的剧场”

王永是个十分活泼的人,一上车就跟人家说话,因此他和很多乘客成为了朋友。在他拉乘客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故事,“我的车就是移动的剧场。”王永打了一个这样的比喻。

在他的车上发生过很多事情,有励志,有爱情,也有凶险。

他经常在车上给年轻的外地朋友讲自己在北京的奋斗史。有一回,一个女孩搭一段车程说要坐火车回老家邯郸,她觉得在北京呆不下去了。王永问:“我在北京住过地下室三层水帘洞一样的房子,睡过沙发,地板,还曾每天骑自行车几十公里,你有毅力吗?”女孩摇了摇头,于是半路下车,不回老家了。

当然,他也遇到过险情。有一天晚上进城办事,路过车站的时候王永习惯性地将车送人。一名男子上了车,不停地问他:“你真的不收钱?你图什么。”王永就讲了自己当年创业时的艰辛,以及受过很多人帮助,也想帮助别人。这样讲述了一路。男子沉默了一会,突然说停车,留下一句“兄弟,你以后要小心点,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便径直走了。

## 一周道德点击 李瑾

### 反驳的背后

【新闻记录】

国家电网公司在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的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按每套房三口计算,可供近2亿人居住。北京市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志就此反驳说,这个数据有错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一年内空置的房子很正常,就像现在政策收紧时,销售就受到影响,房子卖得慢。不过,北京的空置房量并不多,在正常的水平范围内。

【道德点击】

瞧,但凡有一点点影响房地产商利益的消息出来,类似陈秘书长所在协会一样的“组织”就会迫不及待地出来辩白。如此挺身而出的原因,不用太多琢磨也能猜得出来。在房价的问题上,越是到了决定调控走向的关键时刻,话语权的博弈就越显刀光剑影。既然房地产业协会是为房地产商撑腰打气的,老百姓们以后就别再被他们轻易忽悠,把他们所谓的专家声音当成耳边风好了。

### 公平的背后

【新闻记录】

广州著名的富豪别墅区宏城花园里面有几栋违章别墅,广州市长要求限期自行拆除。期限到了,三栋违法建筑被强制拆除。据说,这些豪宅级违章建筑一度不敢拆、不好拆,是因为有业主曾经威胁“我有后台”。央视《新闻1+1》以《有一种“强拆”叫公平!》进行报道,认为这次强拆不仅仅是一个拆不拆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公平是不是被捍卫的问题。

【道德点击】

广州的违章建筑终于拆了,媒体发出“公平”的叫好,民意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法律也维系了自己的尊严。可是,想想那么多城市出现过的那么多“下不为例”、“补交税款”的前例,又觉得一定会有很多保住了既得利益的违法者正在暗地偷着乐。很多时候,政府面对既成事实的无奈禁声,常常选择一条妥协的中庸路线,人为地给法律留出了边缘地带。的确,公平不应该在这种中庸的妥协面前打折。

### 污染的背后

【新闻记录】

身处“环保门”的紫金矿业最近爆出,集团充斥着众多“红顶商人”,直指污染问题与地方政府保护有直接关系。对此质疑,上杭县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表示,“以前扶持农业,官员下乡都没问题,现在扶持工业,官员进入企业的道理也一样。”该负责人表示,紫金矿业在发展过程中人才紧缺,而公务员的确“素质较高”,正是企业所需要的,而一些退休老干部则是“发挥余热”,“符合国家有关政策”。

【道德点击】

那些头顶官帽的官员进入企业,是以个人素质扶持企业、发挥余热,还是利用政府背景为企业撑起一把保护伞,各种微妙的关系,恐怕也不是这位宣传负责人这么一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污染触目惊心,而又瞒报9天之久。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的盟友关系,令司法问责晦暗不清。而紫金矿业甚至不必为当地民众的生命健康负责,而由当地政府全权打理所有污染局面。面对如此糟糕的结局,那些高素质的官员们,为紫金矿业究竟带来了什么?

### 美言的背后

【新闻记录】

《唐山大地震》全国公映,票房井喷,制作方流露出票房超5亿的得意神态,5分钟的天崩地裂、若干个催泪场景,让很多观众泪眼婆娑。不过,“植入广告太露骨”依然成了这部巨作的“硬伤”。影片中,剑南春、白象电池、宝马汽车、工商银行、KAPPA相继露脸,甚至逼出来“用中国人寿,踏实”这样直白的广告词。

【道德点击】

冯导自己说:这不是一部灾难片,我要展示的是中国人的人文精神。然而,在这部号称“心灵史诗”的影片中,冯导也从打算遮掩将悲剧商业化、金钱化的用意。“5亿元票房”的得意,诸多露骨的植入广告,以及商业投资回报等等辩白的言论,无不为此部人性大戏增加几许令人反感的味道。说白了,这种做法无异于打着“人性”的名义将观众赶进影院,以“不看就是缺乏同情心”的大棍子逼迫大家认购掏钱,是借人性、灾难的幌子,确保商业化影片的票房盆满钵满。

# 49条生命拷问“领导下井”

■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 刘彤

7月17日到18日,河南、陕西、湖南、甘肃、辽宁五省接连发生5起煤矿事故,截至22日凌晨,造成了49名矿工遇难,6人被困。而就在10天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刚刚部署安全生产工作。从5起矿难暴露的问题看,“硬规定”在这些煤矿只是“软执行”,煤矿在落实国家政策规定中仍存在诸多“死角”。

## 追问一:“领导下井”为何打折扣?

7月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严格企业安全管理,“企业领导要轮流到现场带班,煤矿和非煤矿山要有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

这一规定的提出,立即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认为煤矿领导与同时下井、升井,必将有效遏制煤矿事故的高发势头。

记者调查发现,5起矿难基本上没有矿领导守在现场。几经辗转,记者才发现韩城市小南沟矿难中有一位“机电矿长”的名字。这家正在技改的小南沟煤矿,共有包括矿长、生产矿长、安全矿长、机电矿长和技术总工程师在内的5名“矿长”级领导。在这次矿难的28名遇难者中,就有机电矿长夏学国,他下井4小时后煤矿发生了电缆燃烧事故。

这家煤矿生产矿长孟宪宝介绍,虽然5名“矿长”平时都会随同班工人进入井下,但是工人一班的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而矿长一般只在井下逗留4到5个小时,不会与工人们同时升井。“一把手”矿长有时下,有时不下。”

这个矿的一些工人也告诉记者,“矿长”下井不仅没有工人呆的时间长,也不会一直待在危险最大的工作面。“矿长是领导,可能要检查的地方多。”尽管一些工人对此表示出

理解,但国家规定的“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的要求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还是打了折扣。

## 追问二:“安全投入”为何不到位?

煤矿安全投入不足和投入不匹配,导致煤矿在生产过程经常出现安全隐患和漏洞,这也是矿难频发的重要原因。

河南汝州新岭煤矿和陕西韩城市小南沟煤矿矿难,分别造成8名和28名矿工遇难。这两起矿难的原因都是由电缆着火引起。前者是因为电缆接口出现问题,迸发火花引发井下火灾。后者是因为一辆材料车刮断动力电缆,致使阻燃电缆着火,引发巷道内木质支架起火燃烧,并点燃煤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按照规定,煤矿使用电缆应为矿用阻燃屏蔽电缆,电缆芯数、芯质、接口有明确标准。一般使用国标电缆,这类火灾事故会少得多。

同样,由于投入不匹配,许多小煤矿仍采用木棚支护,没有采用承重更大的单体液压支柱。正因如此,小南沟煤矿在电缆起火后,迅速点燃木质支架,引发井下火灾。

“与高额利润相比,一些煤矿在安全投入上花钱太少,出问题的煤矿基本都存在安全投入不足的问题。”有着20多年管理经验的徐矿集团总经理助理孙海长期研究国内各类煤矿事故,他说,装上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瓦斯抽放系统等,就能对通风、火、瓦斯、煤尘进行实时监控和处理,爆炸事故自然就少得多。

## 追问三:“违规生产”为何不制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矿难的密集发生,与违规生产行为密不可分,如超能力生产、边建设边生产等,这些都为煤矿安全埋下

了巨大隐患。

今年以来我国煤炭市场需求强劲,市场价格走高。韩城市一些煤炭企业介绍,这里煤炭根据煤质不同每吨价格在450元至780元不等,但各类成本投入每吨煤才200元左右。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类大小煤矿都在加紧生产,“抓时间,赶进度,多挣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王树槐说,国家明令禁止在煤矿技术改造期间边建设边生产,但韩城市小南沟煤矿却在尚未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就进行生产,最终导致28名矿工遇难。

造成7人死亡,6人被困的甘肃金塔县煤炭公司子煤厂,也属于这类情况。这家在建矿井,在18日发生透水事故时,就已试生产原煤2000余吨。

“煤炭市场一走高,不论国有煤矿还是民营煤矿,都容易出现超能力生产现象,民营煤矿更为严重。核定年产量15万吨的煤矿,实际产量经常突破20万吨。”陕西一位国有煤矿企业负责人分析:“这必然使生产系统变得复杂,安全隐患就会增加,发生事故的几率也随之加大。”

正是对一系列规章制度的麻木不仁,“硬规定”变成“软执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明显的迟报矿难现象。按照规定,煤矿发生事故后,煤矿应在1小时内报告。王树槐说,小南沟煤矿发生矿难是17日20时10分,有关部门直到18日早上5时左右才向国家煤监局报告,“比国家规定迟了好几个小时。”

## 道德观察

# 3龄童之死呼唤沉睡的职业精神

■鲁开盛

20日,广东江门市蓬江区金晖幼儿园被有关部门责令提前放假,并接受安全隐患整治。19日,该幼儿园一名3岁幼儿廖浩然因园方过失而被园校巴士近8小时,被放学的老师发现其倒在巴士内,因窒息抢救无效死亡。(7月21日《广州日报》)

被困巴士近8小时,3龄童活活“闷”死。这是一幅多么悲壮的画面,这是一曲多么沉重的哀歌;闷热、饥饿、哭喊,哭喊无人回应,最后躺在车厢离车门大概一步远的地方窒息死亡。可以想象,可怜的娃娃瞪大双眼经历了何等惊恐和绝望。

幼儿廖浩然死得太冤了。他有三个环节可以免责,但都被“玩忽职守”的大人们错过了。一是校车回到幼儿园停车时,责任人没



## 抗洪“父子兵”

7月22日,唐仁旺父子在长江九江段东升大堤插上党员先锋队的旗帜。

在江西庐山区新港镇的长江大堤上,每天都能看到一对“父子兵”参与防汛抗洪的身影。父亲唐仁旺是一名80岁的老党员,有着52年党龄,曾参加过1954年、1983年和1998年的大洪水防汛工作。今年从长江水位开始上涨,他就自发每天步行四五公里到大堤上查看水情,并向参与防汛的年轻人传授经验。他的儿子唐厚文,现为新港镇洪堤埂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吃住在大堤上,每天带领着村里的党员干部24小时坚持巡堤查险。

新华社记者 周科摄

有检查车内情况就锁好车窗车门离开了;二是跟车工作人员没有履行幼儿交接记录;三是班主任老师发现幼儿缺席,居然不过问。

3岁幼儿死于校车能否唤醒沉睡的职业精神?善良的人们都会为之扼腕,尚未怒放的花骨朵就匆匆凋谢了。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我们常讲的职业精神在哪里?那一份对职业的敬畏感又在哪里?即使是放羊,出去回来总得点点数,看看羊少不少吧?

目前不少议论都围绕赔偿数额展开,似乎拿出钱来平事就够了。笔者认为,经济赔偿和赔偿是必须的,但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更有必要。因为赔钱了事,不足以震慑相关人员,也不足以告慰幼小的无辜亡灵。可以肯定,如果今天的相关责任人得不到刑罚制裁,那么明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廖浩然悲

剧重演。

问题是,足够的激情和道义并不是惩罚校车死人责任人的理由和依据,我们拿什么追究他们的责任?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条款,就使得相关负责人逃避了刑罚。而花钱平事,最终导致相关人员侥幸心理日甚;与之相应的,则是家长们的恐惧心理日甚——道途自在的人依旧逍遥自在,如履薄冰的人继续如履薄冰。

道德教化是靠不住的,于是有了刑罚。刑罚的目的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谁都不能否认,孩子的一切就是一个家庭的一切。而幼儿园,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服务对象都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这样的机构,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幼儿园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完全可以依照“玩忽职守”来定罪量刑。所谓“玩忽

职守”,是指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为实施了玩忽职守的行为,并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建议增设“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有法可依,才能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不妨将“玩忽职守”的犯罪主体拓展到多个职业,比如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增加一款:“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参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量刑。”

每一个头顶上都应高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职业成为一种荣誉更成为一种鞭策的时候,当每个岗位上的人都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不辱使命的时候,当每个人都能守好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的时候,当每个人可以估算一下,幼儿廖浩然之死的概率还能有多少?



(部连平摄)